

谁最了解日本

许介鳞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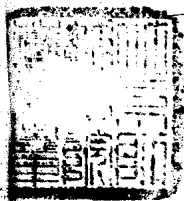
谁最了解日本

许介鳞 著



21168253

中国文史出版社



1168253

责任编辑：丁小梅

谁最了解日本

*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劲松装订厂装订

*

1989年2月第一版·1989年2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6 插页：1 字数：151千字

印数：1—3500册

ISBN 7—5034—0054—6/K·0044

定价：2.40元

出版说明

本书是台湾故乡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的《谁最了解日本?》四部丛书中的一本,原名为《近代日本论》,是台湾日本学权威,现任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许介鳞所著。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也是亚洲以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展的强国。研究和了解日本是包括台湾同胞和学者在内的每一个中国人最为关注和感兴趣的课题。许介鳞教授以他对日本历史的深入研究和深刻的洞察力,对日本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的剖析,用翔实材料,简明生动的文字,严密的逻辑论断,深入简出地论述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军国主义、天皇制思想等近代历史上的重要课题;揭示了日本通过对中国、朝鲜以及亚洲其他邻国的侵略和掠夺,使资本主义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真正原因;告诫人们要时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重新抬头;一针见血地批判了1928年戴季陶写的《日本论》、1963年日本学者林房雄写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1962年美国驻日本大使赖谢和写的《日本现代化论》等书的种种谬误。

作者许介鳞在本书中剖析日本的许多观点和认识,是与大陆学者的看法相一致的。这反映了海峡两岸学者之间,虽然长期处于隔绝状态中,但作为炎黄子孙,彼此间是心心相印的。长期以来,我们大陆学者一直期望能与台湾学者间相聚和交往,共同切磋学术,探讨未来。现在台湾当局已开放大陆探亲,放松对大陆出版物的限制,海峡两岸学术交流已见端倪。本社愿借此机会将《谁最了解日本?》一书奉献给广大读者,以促进相互了解。我们深信,本书的出版,一定会受到广大关心和研究日本的读者的欢迎。

2094/25

本社在决定出版本书时，已征得台湾故乡出版有限公司的同
意。

本书根据1987年5月30日台湾故乡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的中文版《近代日本论》一书原版排印，谨将竖排改为横排，繁体字改为简化字，异体字和错排字也作了改正。原版中的日文与英文书名注释，一律译成中文。作者近影为本社所加。

本书承蒙北京师范大学政治系教授蔡德金推荐，并提供原版书，谨致谢意。

前 言

现在坊间流行对日本的“模仿复制品”(COPY),而缺乏对日本的“创见”(originality)。拾日本人的牙慧容易,给日本人还以颜色难。“一个中国人如是说”,变成“一般中国人如是说”,是出版本书的期望。(本书原系以日文创作,书名《中国人の視座から・近代日本论》。)

目 录

前 言	(1)
序 论：一箭三雕	(1)
第一章：为攘夷而开国	
——攘夷与开国的矛盾和统一	(15)
第二章：福泽谕吉	
——对朝鲜的谋略	(35)
第三章：第一次中日战争	
——设下圈套的战争	(52)
第四章：右翼所扮演的角色	
——亚洲主义者的轨迹	(68)
第五章：张作霖炸死事件	
——炸开了“北进论”	(86)
第六章：币原外交	
——日本“全方位外交”的原型	(99)
第七章：昭和维新	
——北一辉和对日本革命的破坏	(120)
第八章：日本的天皇制	
——御前会议的真相	(149)
终 章：对日本的期待	
——成为“和平主义”的最先进国	(168)
后 记	(181)

序论：一箭三雕

一箭三雕，乃本书立论的目的。所谓三雕，就是第一戴季陶的《日本论》，第二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第三美国赖谢和（Edwin O. Reichauer）所代表的《日本现代化论》。以下依序叙述我要击落此三雕的动机。

说来惭愧，我第一次阅读戴季陶的《日本论》，并不是原版的中文本，而是翻译的日文本。我是在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担任教职，也算是混口饭吃。记得1972年夏天一个晴朗的日子，我收到东京的友人T先生寄来一个书籍包裹。在这宝贵的精神粮食当中，夹杂着一本装订相当精美的书本，那就是戴季陶的《日本论》。

封面印着市川宏译·竹内好解说·社会思想社出版等文字，里页则记载1972年3月30日初版第一刷·5月15日第二刷等字。我迫不及待地先读附录，从竹内好的解说看起；接着一口气读完桥川文三所主持的探讨戴季陶《日本论》的座谈会记录。我仔细斟酌关宽治、小松茂夫、今村与志雄、山口一郎等人的发言，然后才精读正文。全书读完后，我有点无法释然，于是跑到台北市内的中央文物供应社，买了一册中文原版本。该书薄薄的，装订简陋，定价仅新台币5元。厚厚且装订豪华的日文版，与薄薄且装订粗陋的中文版，成为鲜明的对比。这难道是显示两国经济生活水准的差距吗？

戴著《日本论》，自1928年在上海出版以来，至今在日本已经

出版五种以上的译本。我出于好奇心，问了台湾大学的教授及学生们，看谁读过那本书，遗憾的是没有人读过这本书。唉！两国不但在经济生活，就是在文化生活也有很大的差距。

竹内好在其解说之中，举出中国人所写日本论的三“白眉”，即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戴季陶的《日本论》和周作人的散文集。他又评论说：“若要从其中只选一本的话，戴季陶当首屈一指。”^①戴著真是这样完美无缺的书吗？

这本书是在战前执笔的，对战争末期日本如何穷困挣扎，或战后盟军占领下价值观念如何转变，恐怕无法放入视野之内吧？潘乃德（Ruth Benedict）的《菊花与剑》，在今日年轻人的眼光里，都嫌其陈旧无聊，那么半世纪以前的《日本论》，更难免有陈腐之感吧！再说，戴季陶虽然在中国人当中被认为是道地的日本通，那么就算他精通东洋文化吧，他也一定疏于西洋文化才对。他当然不可能知道今日美国会流行现代化论，就是西洋近代市民社会的历史，恐怕他也没搞通吧！因此他无法从世界史的观点来比较东西文化，并从此基础来构筑日本论。而且，戴季陶是孙文先生的秘书，拥有实际从事政治活动的经验，故在思想上难免从自己的政治立场来评估日本的政治家。例如：说桂太郎有高远见识，乃最有能力的政治家，而对他评价很高；相反的，说田中义一是反动潮流中“失败的非英雄”，而对他严厉批判。但是从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桂太郎和田中义一，两人都是一样的长州阀，可以说是一丘之貉。

尽管戴著在时间上、空间上以及思想上有种种限制与缺陷，那么为什么日本的大众传播界，仍不厌其烦地再三出版这书呢？是不是半世纪以来在激烈的历史变化当中，“中国人的日本观”还是没有多大的改变？再不然，就是在这半世纪之间，中国人对日本未稍加研究，日本人如果想知道“中国人的日本观”，便不得已

^① 戴季陶著，市川宏译：《日本论》（东京，社会思想社，1972年），第244—245页。

以冷饭（戴书）来充知识上之饥吧！

戴季陶在其著作的第一章“中国人研究日本问题的必要”中，以悲痛之声警告：

“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是一味的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做“思想上的闭关自守”、“知识上的义和团”了。^①

这痛烈的批评，经过半世纪以后的今天，仍然适用于中国的现状，因此也震撼了我的心坎。戴著之所以受到日本人的特别器重，其秘诀从这一点可以窥见。但是戴季陶之论，不能说是很娴熟无缺的。小错误姑且不用说，大偏差我试举出三点来看看。

第一，他对明治维新理解的深度。他推论说：“幕府一倒，‘尊王攘夷’四个字的目标，就变成了‘开国进取’。攘夷和开国，是两个矛盾的倾向，而这两个矛盾的倾向，都造成了日本今日绝盛的基础。”^②然而，问题是“尊王攘夷”何以转变成“开国进取”？何以攘夷和开国的两个矛盾倾向，能成为日本绝盛的基础呢？他并没有论述解答。他只看到表面的矛盾现象，然后就说这矛盾本身就成为发展的基础，足以明证其对明治维新的理解仅止于表面的层次。他欠缺将此矛盾统一的概念，亦即日本是“为攘夷而开国”。

第二，他对日本军国主义理解的方法。他说：“到日俄战争后几年止，日本的确是一个彻上彻下的军国。”^③换言之，他认为日本到日俄战争时还很好，只是日俄战争以后，才变质为可恶的军国主义。这种“中途变质”说，在理论上缺乏一贯性，因此林房雄得以反过来利用说，既然到日俄战争时的日本很好的话，那么日

① 戴季陶：《日本论》（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4年），第2页。

② 戴季陶：《日本论》，第26页。

③ 同上书，第53页。

俄战争后的日本也应该很好才对，并在其《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加以驳倒。

以西乡隆盛的征韩论为例，看看戴论如何被林房雄反过来利用。戴季陶评论：“即以事业说，西乡的征韩论，直到死后18年（1895年中日战争），依然成为事实。到死后30年（1910年）日本合并韩国，公然达到目的。”^①林房雄即引用这一段，并且自豪地说这句话是“奉献给西乡最好的挽词，何况这是身为日本‘侵略’对象的支那人的发言。”^②并以此证明日本在亚洲从事侵略战争的正当性。

第三，他对天皇制思想评价过高。戴季陶对“日本国体”，虽然评论说这是基于“神权的迷信”，但是又据此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日本人向来也有一个迷信，以为他们的国体、他们的民族，是世界上哪里都找不出来的，是神造的。皇帝就是神的直系子孙，所以能够‘万世一系，天壤无穷’。”^③“而这一种新国家色彩，又由宗教的信仰，和文学美术的陶融，赋予以较为优美高尚而有力的世界性和社会性。后来日本种种进步，都要算是这一个时代的产儿。”^④

如此，戴季陶把天皇制思想看成迷信，又加以特别赞美。于是，在探讨戴季陶《日本论》的座谈会上，学习院大学的小松茂夫教授说，迷信还有“肯定面的评价”而感到惊讶^⑤。林房雄进而将其改装为“天皇民俗说”，以充当为支持其“武装天皇制大跃进”的论据^⑥。

明治维新、军国主义、天皇制思想，这些都是日本近代史中

① 戴季陶：《日本论》，第36页。

② 林房雄：《新订·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林房雄评论集》第6卷，第77页。东京，浪曼，1974年）。

③ 戴季陶：《日本论》，第3页。

④ 同上书，第6页。

⑤ 戴季陶著，市川宏译：《日本论》，第195页。

⑥ 林房雄：《新订·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第94页、101页。

最重要的课题；然而戴季陶的评论，竟然蕴涵着这么多的缺陷，可是竹内好还论断，戴氏“日本论”可以“总括的代表中国人的日本观^①。”我不服日本人的论断，抑制着满腔的羞愧，沉着地执笔拟起我的《许氏日本论》。我特别对明治维新、军国主义、天皇制的问题，审慎地思虑再三。

我曾以日本政府奖学金到日本留学，那是1963年4月，入学于东京大学大学院法学政治学研究科。赴日之后不久，该年9月号的《中央公论》，开始刊登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从此共连载了两年多之久。当时，我深深地沉溺在东大浓厚的学术气氛中，对于林房雄的这一派胡言，以为不值得一顾；当时我只阅读了有关的书评，根本就没有浏览其本文的心情。然而，1970年回国服务以后，再经过了4年的某一天，我所指导的日本留学生K君，无意间带了一本新修订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到我的研究室来。唉！中国人不值得一顾的这种书，今天却由日本人带到海外来。这本书，跟国际牌电视机、新力牌电晶体收音机、日立牌电冰箱等等一样，也都是日本人推销到海外的商品。但是，不止于普通的商品，还输出戴季陶或林房雄的著作呢！我深深地痛感到，两国之间的差距，不限于经济方面，也至于文化思想方面呢！

陷于深刻反省的我，即开始彻底而细心地详读《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按着每章每节做起笔记来。林房雄的笔法相当辛辣，采取批斗的文体，论述重复也不厌其烦，条理井然，可说：“自成一家之言”。说老实话，我从林房雄的逻辑推展中，得知许多日本近代史所隐藏的侧面。在查证这些日本近代史的“羞耻部分”当中，我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总批判”的原稿也逐渐堆积起来，然后与其他的研究论文编在一起，就变成中文版的《日本政治论》，于1976年在台北出版。如果没有林房雄的谬论，恐怕也没有

① 戴季陶著，市川宏译：《日本论》，第214页—216页。

许介麟的日本论，我应该对去世的林房雄深表谢意。

但是从日本输入的这些“文化”产品，我潜意识地认为自己有义务将其加工改造，然后再输出日本。如果仅单方面的从日本接受其文化或思想的输出，而没有给予回馈的话，我所敬畏的日本，将丧失其自动调节的机能，而无法修正其谬误吧！今天美国所以百病丛生，也就是太过骄傲地仅单方面输出文化，藐视其他地方为文化较低，而缺乏其他文化圈的回馈所致。就是阿雷克斯·黑利（Alex Haley）的《根》（Root），也并不是从非洲黑人的观点来回馈以探讨问题，而是完全美国化的黑人在美国国内兴起的一种想法。因此《根》这本书，透过大众媒体宣传而谈论起“黑人问题”，但是不能抓住核心来根本地解决问题。

日本自从1945年8月15日战败而价值观转变以来，至今历经了三四十年的岁月。随着价值观的多元化，其自我调节的机能也逐渐衰退起来。林房雄以日本的经济复兴与高度成长为背景，对日本在“8月15日”以前所从事的战争，给予有其必然性或正当性的重新评估，来驳斥战后创设的民主主义或和平主义的基本价值体系。而日本社会对此谬论也放纵不顾，不能自行调整而拉回到基本价值的出发点。

自从《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诞生以来，已经有20多年了，日本的报章杂志虽然也有过异论，但是始终没有一篇论文根本地驳倒林房雄的谬论。日本人自己的批判，一般的说，都不是从历史事实的验证来加以反驳，而是根据他们个人的信条或学说来驳斥，因此他们的评论当然不是林房雄自称精心调查内外史料的对手。结果评论也仅止于各说各话，在议论不分胜败的情况下，《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就成为长期畅销书，堂堂地摆在书摊上，甚至还输出到海外！

日本的知识分子，属于老一辈的，绝大多数是沾血腥的“战争协力者”，如果他们彻底地批判《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话，那无异是自打嘴巴，陷入自我矛盾的困境。为什么呢？因为日本现

有的一切，都是建立在大东亚战争的基础上；如果日本人完全地否定过去，那不是也将否定现有的一切，而失去立足点了吗？对历史的这种顾忌和疑虑，正是产生《大东亚战争必然论》的思想温床。

属于年轻的一代，就是那些“不知道什么是战争的孩子们”，他们在战后受美国型生活方式的影响，在大众消费时代享受舒适的生活，坠入无气力、无关心、无责任感的“三无主义”，对从前的“大东亚战争”，不是没有关心，就是顶多只有模糊的印象或传闻。但是我们期待他们能从我的严厉批评当中，翻开从前的历史记录，挖掘有关“大东亚战争”的史料，重新检讨历史。因为，他们今天立于一个时代的分歧点，可以将日本的过去做比较客观的判断。

在日本的自动调节机能尚未恢复的情况下，只好由我尝试“越俎代庖”，对日本的谬论开刀。这也算是我对日本的一个回馈，由我刺激日本促其反省，也必有其意义存在。我的愿望说穿来，就是透过对日本近代史的正确认识，跟日本国民共同努力于“维持和平，从这地球上永远扫除专制与隶从，压迫与偏狭”（日本宪法前文）。

林房雄本来就是一个努力型的人，不是天才型的评论家。他产生《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想法，一般人都以他的思想从左派“转向”右派的背景来加以说明，然而我认为有一个不可忽视而且非常重要的因素，亦即美国学者赖谢和给他一种启示。在此，先从我个人的经验谈起。

在1963年春天，当我刚进入东大之时，日本的政治学泰斗丸山真男教授，正在主持一个“探讨现代化各种问题”的研讨会。研讨会所使用的资料，乃丸山教授在前一年参加箱根的现代化研究会时美国学者们所提出的报告。当时丸山教授的研究重点，正从早期的“超国家主义”理论转移到“现代化”理论。我参加丸山教授所主持的研讨会一个学期，专心听有关日本明治维新“成

功”和中国洋务运动“失败”的种种议论。这时我的脑海中，不断地盘旋起一个问题来，“为什么日本能够这么快速地达成现代化，而中国却迟迟地无法步入现代化的轨道？”如果从美国学者的“现代化”这种价值观看来，日本近代史包括侵略亚洲的轨迹，正是可以被肯定的了。在“日本成功”与“中国失败”的价值观威压之下，我茫然而畏缩不敢置评。约当丸山教授的研讨会将结束时，在报纸广告栏，我看到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第一次上场。但是，当时的我，认为美国的现代化论和林房雄的战争肯定论，是两个各不相干的论理，未能觉察其间还具有相当的因果关系。

在东大的象牙塔中，我在政治学上受丸山的“近代政治学”、法学受川岛武宜的“法社会学”、经济学受大塚久雄的“大塚史学”等这些现代主义者的学术熏陶。我当时对美国学者赖谢和之流的现代化论，虽然怀抱疑问，但我在学问方面的功力尚未能抵抗“现代化”那种冠冕堂皇的价值观。只是令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日、美两国学者虽然都同样的站在“现代化”的价值观上，可是对“日本现代化的性格”，却下了完全不同的评价。日本学者的作风，主要目的在挖掘日本传统固有的否定面，主张必须更加“现代化”；而美国学者的态度则反之，致力于强调日本“现代化”的肯定面。在“现代化”的价值观非常普遍的前提下，我以亚洲留学生如何看明治百年为题，在1968年3月号的《中央公论》，发表了一篇“明治维新与政治思想”的纪念论文。这篇论文是从“文明开化”和“侵伐霸道”，两个互相对立的思想如何展开，来把握日本近代史的进展，但在结论称赞那些被称为现代主义者的日本学者在战后所致的努力，因此我的这篇论文也就被评为圆滑而不出纰漏。

日本学者专门指点日本的黑暗面，我们不能据此说他们不爱国。因为他们指出了黑暗面，所以日本才能向更光明的方向迈进。可是林房雄就严厉地指责这些日本学者为丑化日本的恶党；

相反地，又把美化日本史的美国学者的说法，拿来支持自己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从林房雄的立论和美国学者的说法有相似之处来看，我直觉地感到“敌人就在新大陆”。如此，我推想《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乃是得美国学者的启示而诞生的，换言之，这是美国现代化论在日本流行而产下的“私生子”。我试推演我的假设看看。

美国人的日本研究，从以前传教士为中心的个人研究，转变为美国陆海军设立日语学校，拟定专门计划大量培养人才，乃是起因于“珍珠港事变”这个战争的冲击，促使美国必须从事“敌国研究”。这些在军方的外语学校培养的数千名毕业生，战后成为盟国占领军队的一员，在日本驻留了几年，其中较优秀的人，今天都站在美国各大学日本研究所的第一线，成为远东问题的专家。^①

现代化论的诞生，在另一方面乃渊源于美国对后进国开发理论失败之后的心理反动；1955年之后美日结成友好同盟国，为了维持东南亚的安定以及促进其经济发展，现代化论也成为冷战体制下对抗共产主义的一种意识形态的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为了援助后进国的经济开发，投入了大量的资本与技术，希望与当地丰富的劳力相结合，促使后进国产业化和现代化。但是结果事与愿违，这些后进国仍旧不能持续地开发成长。因此，美国学者才发觉，光凭资本、劳力、土地等生产因素，并不能使后进国自动自发地发展经济。换言之，美国学者才领悟到，产业革命无法输出的道理。从这实验的结果，他们觉察到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必须考虑文化、传统等非经济因素。于是他们就开始提倡“现代化”论。

可是，据美国学者的见解，在19世纪后半叶以后，那么多非西洋国家之中，只有日本是唯一以自力发展经济而成功的。因

① 参照官川又次编：《美国的日本研究》（东京，东洋经济新报社，1970年）。

此，日本就成为后进国开发理论所导向的一个综合性“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最佳模范。他们认为，日本迅速达成产业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可以成为今日后进国开发的指南。

从这种问题意识和研究方向，美国学者就开始挖掘日本在德川时代的封建遗产，进而伸向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领域研究。他们甚至主张，德川时代的日本封建制度跟中世纪后期欧洲的封建制度相类似，而给予肯定性的评价，然后说这种罕见的封建制度促进了日本的现代化^①。然而他们又巧辩，日本的传统社会虽然已经具备了往现代化社会发展的潜在条件，但并不是说日本能独自地发展而转化为现代化社会。他们用暗示的手法指点，19世纪后半叶以后的那种“西洋的冲击”(Western impact)是日本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个“西洋的冲击”论的葫芦内所卖的膏药就是，假如东洋社会没有西洋的打击或刺激，则将永远停滞而不能转变为现代化社会。如此，西洋列强侵略东洋是合理的一种逻辑，就暗暗地隐藏其中了。

此日本现代化论的代表旗手就是赖谢和。他曾任哈佛大学燕京研究所所长，努力培养美国的日本研究者。1961年他转任驻日大使，就把这种“日本现代化”论踏实地散播于日本社会。他赴任东京以后，在1961年9月号的《中央公论》，发表“日本现代化的历史评价”；在1962年6月10日号的《朝日杂志》发表“对近代史的新见解”；在1963年3月号的《自由》和《中央公论》，分别发表“现代化论的想法”和“19世纪的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此外，他还以论文或著书的方式，努力传播和普及这种理论。日本有名的知识分子，如中山伊知郎、林健太郎等辈，都大表欢迎^②。

① E·O·Reichauer《日本历史的特异性》，《朝日杂志》(东京，1964年9月6日号)。John·W·Hall“日本的近代化——概念构成的诸问题——”，《思想》(东京，1961年1月号)。R·N·Bellah著，堀一郎、池田昭译：《日本近代化和宗教伦理》(东京，未来社，1966年)。

② 参照Reichauer和中山伊知郎、林健太郎的对谈。收录Reichauer《日本近代的新见解》(东京，讲谈社，1965年)。